

经济发展研究资料汇编

亚洲“四小龙”成功之路

山东省经委经济信息中心
济南实用技术经济研究所

经济发展研究资料汇编

——亚洲“四小龙”成功之路

(台湾、新加坡)

山东省经委经济信息中心 编印
济南实用技术经济研究所

编委会名单

主 编：石 军

副主编：张景奎 匡达明 陶 哲

编 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孙 伟 杨 荣 杨保中

李 钢 李广臣 张晓南

陶 贞 梁卫国 戴庆增

第四部分 台 湾

目 录

一、经济发展特点及区域发展研究	(1)
1. 台湾经济成功的奥秘	(1)
2. 试论 90 年代台湾经济转型	(8)
3. 台湾海峡经济圈的构想及其前途	(12)
4. 台湾地区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	(16)
二、科学技术	(23)
1. 台湾科技发展的前鉴与近览	(23)
2. 台湾新竹科学工业园区的回顾与展望	(29)
3. 台湾的计算机革命	
——台湾公司纷纷踏入高技术产品制造业	(32)
三、技术引进	(35)
1. 台湾的技术引进	(35)
2. 台湾技术引进的途径、作用与得失	(38)
四、人才及收入分配	(42)
1. 台湾奇迹的创造者——人才	(42)
2. 台湾劳动力结构的变化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45)
3. 台湾地区个人所得分配情况	(49)
五、贸易经济	(51)
1. 现阶段台湾外贸的特征与发展趋势	(51)
2. 台湾的贸易管理体制与外销渠道	(58)
3. 西欧：台湾省拓展外贸的重点	(61)
4. 台湾经济演替与闽台经贸合作	(65)
六、投资及用债	(70)
1. 台湾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构及其政策变化	(70)
2. 台湾加工出口区投资优惠初探	(75)
3. 台资进军美国刮起购并风	(78)
4. 台商投资大陆的现状与展望	(81)
5. 台湾举借、使用、偿还外债政策的特点	(83)
七、金融	(87)
1. 台湾成龙途中的金融政策	(87)
2. 台湾金融市场分析	(93)
3. 试析台湾金融市场的特点	(99)
4. 台湾的货币政策	(102)

5. 台湾利率自由化研究	(105)
6. 台湾开放民营银行问题研究	(111)
八、物价	(115)
1. 台湾地区的工资和物价	(115)
2. 台湾当局治理物价上涨的措施	(123)
3. 台湾治理通货膨胀的对策	(125)
九、股票、证券及保险市场	(128)
1. 台湾股票市场初探	(128)
2. 台湾股市何以暴涨暴跌	(132)
3. 台湾证券市场国际化给我们的启示及引进台资的渠道	(138)
4. 台湾保险市场初探	(141)
十、工业经济	(148)
1. 台湾开发工业区的土地开发办法	(148)
2. 台湾的石化工业	(152)
3. 台湾以电力为“领航工业”的能源发展方针	(159)
4. 台湾电子工业发展的现状及问题	(165)
5. 台湾利用建筑业振兴社会经济	(168)
十一、中小企业及企业民营	(172)
1. 台湾对中小企业的辅导	(172)
2. 台湾公营企业民营化评析	(175)
3. 台湾民营跨国公司的经营策略	(181)
十二、企业集团及公司	(187)
1. 台湾省集团企业的组织管理特征	(187)
2. 台湾财团向“多国籍企业”发展趋势剖析	(189)
3. 台湾塑料公司的成功探索	(194)
十三、环境、旅游、商业、广告业等	(197)
1. 台湾的环境污染与治理	(197)
2. 台湾旅游市场分析及其对策	(199)
3. 台湾省商业的现代化趋势	(201)
4. 台湾广告业国际化的冲击与省思	(205)
5. 台湾的粮食和农业发展政策	(208)

第五部分 新加坡

目 录

一、经济发展概况	(213)
1. 新加坡：从“小虾”到“小龙”	(213)
2. 新加坡国际化战略管窥	(217)
3. 新加坡经济成功的原因探析	(223)
4. 新加坡经济发展的若干特点	(229)
5. 新加坡经济政策的调整及其影响	(239)
6. 新加坡产业结构的调整及其成效	(243)
7. 新加坡经济考察报告	(245)
8. 新加坡的经济起飞与儒家文化	(250)
9. 新加坡：处于国家控制和市场经济之间的范例	(254)
10. 新加坡公积金制度与国民经济的密切关系	(260)
二、利用外资，对外投资及经济开发区的管理	(265)
1. 外资与新加坡的经济起飞	(265)
2. 新加坡对外投资新格局	(271)
3. 新加坡管理经济开发区的成功经验	(273)
三、金融、保险业及收入分配	(276)
1. 新加坡国际金融中心的特点及其发展前景	(276)
2. 新加坡资金市场的发展	(280)
3. 新加坡银行业的房地产信贷与经营	(283)
4. 新加坡的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	(286)
5. 新加坡企业的工资改革	(291)
四、证券、债券市场	(297)
1. 新加坡证券市场的管理办法	(297)
2. 借鉴新加坡经验加强证券融资风险防范	(300)
3. 新加坡的债券市场	(303)
五、工业经济及企业发展	(308)
1. 新加坡工业化过程中的政治稳定初探	(308)
2. 新加坡高技术工业近 10 年来有很大发展	(315)
3. 新加坡本地企业国际化问题研究	(317)
4. 新加坡中小企业的发展现状	(321)
六、城市管理及住宅建设	(323)
1. 新加坡城市管理的一些做法	(323)
2. 新加坡的住宅建设和住房政策	(326)
3. 新加坡是怎样解决居民住房问题的	(328)
4. 新加坡住宅建设的发展及对我国房改工作的启示	(333)

经济发展特点及区域发展研究

1. 1

台湾经济成功的奥秘

蒋硕杰

在过去 40 年间,台湾的经济增长,被看作发展中国家的楷模。台湾是小岛,面积只有 1.39 万平方英里,自然资源贫乏,人口密度极高,但是,1952—1986 年间,在台湾人口增长两倍多的情况下,每人的实际所得却在同期提高了七倍,而且这还是在全岛经常处于备战状态下实现的。台湾的经验是非常重要的,能使许多发展中国家获益匪浅。

(一)

国民党政府在中国大陆败北以后,在二次大战的创伤下开始重建和发展台湾。当时,台湾的主要工业在二战期间受到协约国空军的严重轰炸,损毁惨重,而人口却由于近 200 万军人和难民从大陆涌入,在原来 600 万的基础上激增,日本人留下的产业,主要是为满足日本市场的需求(如糖和稻料的生产),或是为日本军队提供物资(如炼铝厂),其他工厂规模甚少,只能供应台湾居民的日用需要。一些棉毛纺织工厂是大陆难民之中的企业家从大陆带来,并在政府扶持下建成的。

为了维持近 60 万军队的军力,以及重建迫切需要恢复的经济基础设施,给当时台湾的财政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在预算无法平衡下引发了战后初期急剧的通货膨胀。

那时,经济政策常受两种在学术圈中甚为流行却是错误的观点的影响,其一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最好的途径是,实行高关税或是限制进口数量政策,以保护国内市场并扶持其幼

稚的新产业；其二是，为了刺激投资，即使面临相当程度的通货膨胀，也必须压低利息率，以保证国内新产业能获得便宜的资金供给。

不幸的是，这两个政策弊大于利，结果是，采取这个发展战略的国家经济更加落后，台湾在面临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毅然抛弃了低利率政策，并将币值贬至实际水平，取消了进口定量限制和关税壁垒，使工业化的重点由进口替代转为出口促进。

这一改革的三十年中，随着台湾经济突飞猛进，这一政策得以确立，南朝鲜在后几年仿效台湾，经济同样取得引人注目的增长，根据上述经验，重新考察这一战略很有益处。

(二) 首先，陈述一下前面提到的两个流行政策的理论要点，并与台湾的实际发展经验加以比较。

进口替代发展战略不可行。

这一战略最天真的看法是：发展中国家的传统产业，如原材料、农业、矿产等传统产业无法与发达国家的产业竞争，因此，如果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多种产业，而不只局限于传统产业，那么就必須对新生产业加以保护。这一朴素的观点否认了发展中国家存在比较优势，这可能是由于汇率高估后，导致了某些产业丧失了明显的绝对优势，从而与某些产业不存在比较优势混淆了。(后者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

另一更曲解的观点是：世界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需求是无弹性的(即当价格变动很大时，需求变动不大)，在此种情况下，若取消关税保护和数量限制，就会导致贸易条件的恶化，使国家的福利实际受损，这一论点被称为“弹性悲观论”。

以后的事实表明，这一悲观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实际上，事实证明这一假设是非常错误的，以至于近来学术界的热门话题又转向另一极端，甚至认为所有小国的贸易商品在世界市场上均是有需求弹性的。当然，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两种观点均不正确，而那些相信“弹性悲观论”的国家确实错过一个通过资源的重新配置和贸易来发展经济，从而促进经济起飞的极好机会。而台湾和其他新近发展起来的东亚工业化国家却在他们的实践中获得了成功。

(三)

如前所述，台湾最初也采取了当时流行的发展战略，即通过严格的数量管制和高关税壁垒来维持收支平衡，高估币值，国内通货膨胀持续。在这些政策下，当时的台湾出口品仅限于少数的传统产品，如蔗糖、稻米、凤梨以及少数次要产品；市场的建立仍因循战前的贸易关系，如日本，新的出口产业无法建立，新的出口市场也无法开拓，工业化的努力仅限于发展那些能生产廉价消费品的工业产业，以满足高度保护下的岛内市场的供应。因为50年代早期岛内消费者的人均收入非常低，进口替代产业的操作水平必然低于现代技术的效率要求。

限制进口数量并高估币值的作法，不仅牺牲了比较利益的国内专业化发展的巨大利益，而且也错过了通过扩大市场，发展出口产业而获得的工业规模经营的唯一机会。

1954年夏，已故刘大中教授和我蒙当局召回，提供了我们对经济政策的建议，我们立即抓住这个机会劝说政府采取贬值和贸易自由化的政策，即将汇率贬到合理的水平，以保证贸易的平衡，取消严格的进口数量限制和高关税保护的做法。当时，一位见多识广的内阁首长，曾警告我们说，台湾主要出口品的汇率需求弹性几乎为零，台湾两项基本出口品，糖和稻米合计几乎占50年代早期出口总值的80%，台湾的蔗糖的出口量实际上是固定的，每年由参与国际蔗糖协定的产糖国家共同决定国际市场的份额，稻米则专销日本，每年的出口数量和价格由两国政府直接磋商决定，这两种出口商品的汇率需求弹性实际是零，这位首长认为，台湾作为一个只能生产少数传统出口产品的典型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世界需求无弹性的现实。

如果贬值,只会使台湾的贸易条件恶化,造成进口产品的国内价格提高,进而刺激岛内的通货膨胀。然而,我们始终认为即使传统出口面临着低弹性的国外需求,必定会有好几百种其他新产品,能以丰富和廉价的劳动力来生产,这些产品可以销到劳动力相对稀缺,工资成本高的国家,台湾有相对丰富和廉价的劳动力的优势,不应该因高估币值将之人为地掩盖起来。为了批驳贬值将导致国内通货膨胀的观点,我们指出,在进口品数量有人为限制时,进口品的国内市场价格并不是由到岸成本决定的,而是由国内的有效需求强度和被允许进口的数量所决定,假设总的来说我们潜在出口品的国外需求弹性并非为零,若采取了贬值和贸易自由化的政策,那么出口总值将会增加,进口的商品数量也可以因此而增长,另一方面,如果进口能在实施贬值和贸易自由化后随着出口而扩展,并使贸易持续平衡,以货币形式表示的国内有效需求就没有理由因贬值而扩大,因此,根本没有理由认为进口品的价格会因贬值和贸易自由化而上升。

当然,在最初的数量限制和税率下,实际意义上的进口关税是高于所谓“最优关税率”的,那么,这无疑地是可以因资源的更有效配置而增加收入,所以,只要在资源重新分配的过程中,没有因疏忽而货币发行过度扩张,一般价格水平便不会上升,而也更可能会是下降。

所幸,我们的主张缓慢但逐渐地赢得了当局的赞同,1958年4月,接受我们观点的部长接管了外汇与贸易管制委员会,贬值和贸易自由化的主张终于被采纳,变成了政策目标而被逐渐实施。4月,当局将基本汇率买入价由一美元兑新台币15.55元,贬为兑24.58元,而卖出价则贬为24.78元,更重要的是,出口商(糖、稻米与盐的出口商除外),可将出口所得的数额卖给台湾银行并得到结汇证,他们也可以在进口市场上拍卖,这样便可以通过台湾银行官价购得进口所需要的外汇,同时,为了使结汇证的市场需要量可以正确地反应进口市场的需求,所有准许进口产品的限额(奢侈品仍管制)几乎全部取消。一般而言,进口方面仍然存在高关税,但是20%防卫附加税,由过去以进口额为税基征收转变为以关税支付额为税基征收,这样,在现存的关税制度下,结汇证的市场价格是在固定的基本汇率上加上一个变动的差额,有效汇率趋近于均衡汇率,而且会根据供给与需求条件的变动而自动调整。

此种有效的汇率逐渐适用于所有的进口和出口以及多数的汇款和转移支付方面,最终使得复杂的复式汇率制度单一化了。1959年8月为了遵守国际货币基金会(IMF)的规定,台湾停止实行将有效汇率分为结汇证交易价格和基本汇率两种,并宣布以后的汇率一律为买入价一美元兑新台币38.98元,卖出价则兑38.38元,1960年又升到一美元兑40元新台币,并一直持续到1973年2月。

(四)

贬值和贸易自由化政策对台湾的外贸有显著的作用,1955年开始实行的贬值和减免出口税收政策使出口贸易从1954年的低谷中走出,打破了弹性悲观者的预期,对出口贸易的复生有确实的效果。但是到了60年代,即汇率与放任的进口需求挂钩后,出口的扩张开始飞跃,到了1970年,台湾出口值增加到14.81亿美元,与1954年的最低点9.3千万美元相比,16年间出口总值增加了15.9倍,60年代的平均递增率21.7%,快速的扩张一直延续到1970年,到1980年,台湾出口总值达到198.81亿美元,是1954年的200多倍,70年代的出口额平均递增速度为32.6%。

自由贸易政策下的出口的快速扩张和实际汇率,促使台湾经济集中发展那些具有资源优势的产业,避免发展那些资源约束型的产业,这可以从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动中显现。1952年,农产品和农产品加工品两项占台湾出口总值91.9%,1970年,两项所占份额降至21.

4%，到1986年，它们仅占出口总额的6.5%，相反地，工业产品的出口份额却从1952年的8.1%，迅速上升为1970年的78.6%，1986年的93.5%。

这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台湾这个仅有1/3可耕地而且人口稠密的拥挤的海岛上（非常象荷兰），农出品显然不是国家的比较利益之所在，具有比较利益的是那些需要相对多的人力，但少用土地和资本的产业。纺织、服装、鞋子、伞、玩具和其他轻工业品因符合资源条件而成为台湾早期开发阶段的适合产业。

（五）

台湾在贬值和贸易自由化政策下迅速增长的对外贸易（26年增长200.13倍）是对早期弹性悲观派观点的最好驳斥。另一方面，台湾的实践经验也否定了早期被许多经济学家接受的观点，即一个小国家能使自己的贸易商品自动地面对弹性无限的世界市场。

台湾的经验告诉我们，无论是旧时弹性悲观论，还是贸易商品需求弹性无限的新假说均不正确，这两种观点都不符合实际情况。实际情形是：台湾的总出口额在贬值和贸易自由化下迅速扩张，但其每项出口产品一旦增长到威胁国外同类生产者的水平时，便会遭到设限（数量限制），各种出口产品的国外需求曲线就会突然从水平的弹性曲线变成垂直的零值的弹性曲线，也就是说，每当国外的同类产品开始感到受威胁时，他们便请求政府在进口方面加税、设限（委婉的说法是“自愿限制”）。这样的情形下，台湾只有设法发现新的出口产品与市场。通常地，当新市场受到严重的损害时，就将陷入设限的境地，另一种选择是去发现新的可以出口的产品，但也将重复类似的情形，这可以从台湾农业和出口制造业的发展方向得以很好地说明。

如上面提到的，台湾迅速增长的人口密度，很快地使得稻米出口无利可图，代之的是鲜蘑的生产与出口，因为，蘑菇生产可以在小棚里搭起的草垛上生产，几乎不占耕地，这个新作物很快便成为大宗出口项目，每年能获取几百万美元，当然，不久美国开始对台湾鲜蘑出口实行所谓的“自愿设限”，台湾又开发了欧洲共同市场，这个鲜蘑出口的新市场，同时又开发别种新的出口作物。芦笋的出口也具有同样的经历，美国以及欧洲共同市场开始限制进口台湾芦笋，台湾便不断地发展新的出口产品和发现新的市场。如出口日本市场的鳗鱼和洋葱，出口欧洲的蜗牛等等。制造业的出口也具有相同的情形。

如此，一个小的发展中国家，其出口产品面临的世界需求既不是早期弹性悲观论者所说的无弹性，也不是现代教科书所说的弹性无限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总的需求曲线在一定的区间总是具有很高的弹性（近乎是水平线），不久就会成为一条垂直线，如果企业家能随机应变，他们便会不断发展新的出口品，或为旧产品开拓新市场，便能找到另一条近似水平的需求的曲线，直到成为垂直线为止。

（六）

台湾很幸运的拥有许多能力极强的企业家，但是应该强调的是，正好是在合理的汇率下，出口商能获得完全市场下的利益这一巨大的激励，才促使他们努力寻求新市场和新产品。此外，台湾对于外国直接投资者或参与国内产业开发者的开明态度，也有利于自身的发展，外国投资者经常能带进新产品和新的市场战略。

出口以及因出口而迅速发展的相关产业的重大变化和出口的相对重要性的迅速提高，自然使得台湾的经济结构产生了相应的变化，1951年，农业产品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份额为32.5%，当时工业产品（包括煤矿、制造业、公共事业和建筑业）仅占23.9%，到1970年，

农业的产品份额降到 15.5%，同期工业的产品份额升到 41.3%，70 年代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 1985 年，农业的产品份额仅占 6%，工业的产品份额上升为 49.7%。

国民生产的重心从农业转移到工业对逐渐提高资本收益率和台湾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十分重要的，象台湾这样拥挤的小岛，农业不可避免地会受制于土地报酬递减法则，唯一的途径是通过农业劳力的移出来扩大规模，土地是农业的限制因素，并不是工业的限制因子，生产资源从农业移向工业的资源重新配置，并集中这些资源去发展那些具有真正比较利益的工业产业，是台湾不仅供养了众多的人口，而且是使其人均收入提高了 5 倍的基本原因。贬值和贸易自由化使得资源的重新配置和集中投入成为可能，从而促使台湾走上了出口导向的发展道路。

(七)

尽管资金短缺、通货膨胀、低利率政策不可取。

对外贸易和具有比较利益的工业专业化，带来了人均收入的提高，由此，同期必须引导国内居民增加储蓄，以促进经济起飞。以发展自我增长的能力。

长期看，人均收入增长必须依靠单位劳动中生产资本的稳定增长，除非由技术上的创新和贸易机会改善产生的偶然腾跃，生产资本的增长，必须依赖于储蓄的供应。

发展中国家在努力冲出贫穷陷阱以达到自我增长中面临的主要困难是没有足够的储蓄来进行设备投资，如果解决这一问题，即使在人口膨胀的情况下，也可以使单位劳动的生产资本不断增长，正如 W·A·刘易斯教授指出的那样：“经济增长理论中的一个中心问题是要理解这样一个过程，此过程中，整个社会的储蓄者（投资者）由 5% 转变到 12%，而且还伴随着观念、制度和技术方面的整体变化。”

不幸的是，在 50 年代和 60 年代中，当时流行的货币理论导致了完全错误的政策，其内容是降低而不是提高社会储蓄，在凯恩斯经济学的影响下，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采取了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利息率被人为地压低并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些国家享有更充足的资本和稳定的价格），这种政策认为低利息率能刺激实质投资和经济增长，还能抑制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实际上，在通货膨胀和国内资本严重短缺的情况下，政府强制实行低利率政策，会促使银行借贷需求增长，信用膨胀，而加重通货膨胀，也会减少有组织的金融机构的储蓄，从而减缓国内实际资本的生成，导致资金转向贮藏贵重金属和兑换外币，或者直接投资于房地产等个人不动产或者其它非生产性方面。

在发展中国家中，台湾最先勇敢地抛弃了这一风行一时的低利率政策，1950 年台湾将储蓄存款利率提高到接近当时物价膨胀的水平，才开始时大约高到 100%，1950 年 3 月，台湾银行宣布了“优惠利率存款”的储蓄存款特别制度，每个月的名义利率高达空前的 7%，按照规定依月计算复利，年息可高达 125%。高利率政策对经济的冲击是非常迅猛和成功的。定期和储蓄存款额很快上升，立即由 1950 年 3 月底只有可怜的 600 万新台币，仅占当时货币供给量（现金加活期存款）的 1.7%，增至 6 月底的 2800 万新台币，大约占货币供给量的 7%，最值得注意的是通货膨胀迅速平息下来。1950 年的头三个月，台湾每个月的平均通货膨胀率高达 10.3%，到第二个季度就奇迹般地下降到 0.4%。从 1950 年 5 月开始，价格也开始缓慢下降，这一切惊人的成果，是在台湾时来运转之前发生的，即发生在朝鲜战争爆发、台湾重获美援之前。

可能成功来得太快，也可能由于担心每年 125% 的年息在物价稳定时无法忍受，当局在 6 月份将存款利率减少一半，每月只有 3.5%，而且到 10 月份又减至 3.0%。整个社会在刚有

良好开端时又被当局急减的利率政策冲击，民众很快作出了反应，停止新的银行储蓄，开始取回存款，同年12月底，储蓄和定期存款降到2600新台币，只占货币供给量的4.5%，更严重的是，8月份价格又开始高速度上涨，到1951年2月，已高出1950年7月第一次宣布降低利率时的65%。

1951年3月26日，为了避免再度发生通货膨胀，货币当局，不得不把每月存款利率由3%提高到4.2%（相当于年息为64%），于是，整个社会的紊乱明显地得到平息，银行储蓄以令人注目的速度恢复，1952年3月，储蓄和定期存款已达到2.7亿新台币，占同期货币供应量的31.2%，6月以后，又升至5.4亿新台币，占当时货币供应量的56.4%，那时的价格再一次完全稳定下来。

此后，每当货币当局认为物价稳定后，便开始谨慎地逐步降低利息率。当时由于没有自由货币市场，货币当局只能凭借民众对未来通货膨胀的预期来进行适当的调整，经常难免高估社会对物价稳定的信心和民众的储蓄意愿，以致于过快降低利率，而使物价再度上涨。然而，每当利率再次及时上升时，物价即能再度稳定，银行储蓄与定期存款又能得以恢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72年和1973年的世界范围的通货膨胀使得台湾取得了连续两年的巨大贸易顺差，其总额分别为4.74亿美元和6.91亿美元。由于中央银行有义务吸收过剩的外汇供给，因此，虽然国内货币供给增加的目标是20%（现金与活期存款），但这两年的货币供给增加率却分别高达38%和49%，长时间稳定的物价又开始上升，1972年价格上涨7.3%，1973年价格暴涨40.3%，于是引起了台湾全社会的通货膨胀（至今台湾民众仍记忆犹新），储蓄和定期存款的年递增率由1971年的40%跌落到1973年的21.5%，若不采取紧急措施，增长率将会降为负数，货币当局为了抑制存款增长率下降的趋势，决定提高一年期的利息率和整个储蓄存款的利息率，1973年6月，从8.75%提高到9.5%，同年10月份再升至11.0%，1974年元月又升到15%。这些努力是成功的。1974年总的储蓄和定期存款高达431亿新台币，较上年底增长37.6%还多，而1973年只增长了21.5%，达200多亿新台币，储蓄和定期存款的增加额大约相当于1974年资金供应量的50%，除非银行把借款和投资业务全部交还才能移出这部分资金，因此，这便形成了反通货膨胀的主要力量，使资金增长率降至7%，通货膨胀率很快下降为14.9%，到了1975年价格水平已完全稳定。

台湾的经验证明，适当的定期和储蓄存款利率必然可以吸引公众储蓄，同时是形成反通货膨胀力量的有效手段，从而证明了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理论家的说法，即提高官方控制的低利率会引发国内通货膨胀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

相对稳定的物价和有吸引力的储蓄存款利率唤回和激发了台湾人民传统的节俭美德。

台湾还采取了其他鼓励储蓄和投资的税收措施。例如，免除两年或更长时间的定期存款利息收入税，免除将利润用于投资的公司所得税，这些措施使得更多的储蓄自愿流入银行系统，而成为在汇率贬值和贸易自由化政策下刺激起来的国内投资的非膨胀性的资金来源，这些非膨胀性的资金实现了国内生产性的投资，从1960年起，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快速增长，从而促进了人均收入的提高；另一方面，实际收入的快速增长又使储蓄相对容易，因为在实际收入提高后，国民的消费趋势减缓，以上措施实施后，台湾很快由一个低储蓄倾向的地区迅速转为一个引人注目的高储蓄倾向的地区。

1952年，台湾储蓄占国民收入的比率只有5.2%，但到了1963年，此比率已提高到13.2%，超过了同期的英国（9.8%）和美国（9.1%）。1972年后，开始超过曾为世界第一的日本，1978年，台湾达到了35.2%的极高水平，同年日本为22.3%，英国为9%，美国为8.9%。

(八)

正是这一措施提供了充足的国内储蓄,从而使台湾经济因而得以起飞,台湾成功地从一个不发达国家(或者说一个只能想法依靠外援以保证日益增长的人口的生活水平不至于下降的国家)走向了一个能够轻松地保证个人实际收入很快提高的国家。

实际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必须依靠不断地生产投资,生产投资又必须依靠储蓄以提供资金,正如前面提到的W·A·刘易斯曾把12%或更高的储蓄倾向看作是经济发展成功的标志。更具体的讲,经济起飞的基本条件是国民生产净值中储蓄比率要大于资本产出比率与人口成长率的乘积。

从这一条件看台湾,我们会发现它是怎样逐步达到这个起飞条件的和什么时候达到的。通过表2可以看出,50年代末期,贬值和贸易自由化政策实施之前,起飞的条件还差得很远,当贸易自由化和出口扩张展开后,加上明智的利率政策唤回了台湾人民节俭的传统美德,台湾的储蓄倾向增长迅速,国内储蓄不能满足起飞的基本条件的状况得到了迅速的改善,到1963年,国内储蓄倾向已超过了投资的需要,在人口增长的情况下,保持了一个固定的资本/劳力比率,最初储蓄率只超过3%,但后来,这个超出的差额逐年增大,1964年为7.3%,1965年为8.4%,1966年为11.5%,到70年代,台湾的储蓄倾向持续快速地增长,储蓄率已达20%以上,并逐渐达到了35%的高水平,这表明台湾可以不依赖外贸的输入,完全有能力使得个人的实际收入持续增长。

事实上,在1963年经济起飞之前,台湾必须大力借助外援和外资流入来帮助资本形成,到1962年为止,外援和外资占资本形成的比重总是在30%到50%之间,但1963年以后,外资流入和汇兑快速下降,美国的援助也大大削弱,并于1965年终止,台湾1963年的经济起飞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的,国内储蓄不仅成功地填补了外援的缺口,而且使国内资本形成持续增长,1975年以后,台湾似乎已经有了成为资本输出国的趋势。

台湾发展战略又一成功之处是,尽管工业增长速度迅猛,但收入分配却日趋公平,这与库兹涅茨等权威学者的观点是相左的,库兹涅茨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难免变得更不公平,事实上,许多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都认为平等与增长不可兼得,台湾经济快速增长与收入分配公平同时发生的事实引起了广泛的研究兴趣。通过过去的事实分析,不难解释促成台湾同时兼得快速增长与分配公平的原因,这些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是很难看到的。主要解释在于台湾实行的发展战略中两个最重要的政策不仅有益于收入分配的均等,还有益于劳力的转移。贸易自由化和出口扩张政策,首先促使劳动力从土地密集型的农业转向具有巨大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力从边际生产力低下的农业转移到迅速扩张的新的出口产业,自然大幅度提高了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从而使实际工资率大大提高了。

台湾放弃了由政府强制压低利息率的政策避免了过度采用资本密集型和劳力节约的生产方式,或资本密集型的产业。而其他发展中国家却经常采用廉价资本和国家声望来发展这些资本密集型产业,这种流行的低利息率政策的错误在于虽然投资巨大,但可以吸纳的劳动力却十分有限,迫使大量的劳动力滞留在传统的生产力低下的就业岗位。我们也指出,此种政策还会阻碍储蓄流入金融机构并失去了非通货膨胀性的投资基金的来源。为了避免这种普遍的错误,台湾在大力发展出口产业时,也迅速增加了大量的新的就业机会,使得劳动阶层的实际收入有了快速的提高。

总之,台湾能够兼顾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公平的经验,在于台湾抛弃了战后流行的发展理论,即通过控制和政府操作的办法来加速经济发展,战后至今已有足够长的时间证明两种

相反的发展战略采用的实际效果，第一种流行的限额和关税壁垒政策，为进口替代产业创造了一个有保护的国内市场，通过银行严格的管制和其他金融手段来维持低利率；第二种与前者相反，即在均衡汇率下的贸易自由化和出口扩张政策，利息率由市场决定，这可以最大限度地吸引自愿的储蓄并有利于资本的有效分配。台湾经济发展的成功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选择何种战略是更为明智的。

1. 2

试论 90 年代台湾经济转型

阙永善

一、背景

台湾经济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到八十年代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随着世界经济结构的改变，台湾原有的经济形态已不能适应新的要求，并使台湾经济陷入了巨大的整体性矛盾与困境之中。

(一) 产业形态落后，改变乏力。60 年代和 70 年代台湾经济的增长，依赖于以低工资为基础的劳力密集型加工工业的发展。70 年代末期以来，新技术革命使世界产业结构重组速度加快，劳力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的优势大为削弱，而台湾产业结构仍未有多大改变；至今出口工业品中仍有 70% 是技术层次较低的劳力密集型产品。民间企业受财力、人力和技术的限制，难以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而少数官办企业凭借政治权力控制一些关键部门，垄断岛内市场，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并不热心。尽管台湾当局反复呼吁改变产业结构现状，但效果均不大。台湾有关当局和经济界人士认为，这种局面如不能迅速扭转，台湾经济在不久的将来将成强弩之末，丧失后劲。因此，要保持台湾经济的持续增长，唯一的出路就是改变产业结构，实现经济转型，将原来劳力密集型产业提升为资本、技术密集型高附加值产业。

(二) 高额贸易顺差，引发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抬头。1987 年，台湾外汇储备高达 780 亿美元，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控制，目前仍高达 690 多亿美元。这是自 1971 年以来贸易顺差积累的结果，也是台湾当局促进出口而对进口采取保护主义，压制岛内消费的结果。从台湾贸易顺差的来源看，主要来自美国。随着台湾对美贸易顺差的扩大，加剧了台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危及台湾今后的出口成长，并不可避免地造成汇率和价格的不稳。美国为减少巨额国际收支逆差，增加了对台湾商品的关税与非关税限制，不断压新台币升值，并要求台湾市场对美完全开放，允许扩大美商在台营运业务范围。去年又决定取消包括台湾在内的“亚洲四小”的贸易普惠制待遇，且使台湾实行进口自由化，从而给台湾造成了不断的通货膨胀压力，减少了金融活动的自主性，使台湾当局为了缓和贸易顺差带来的不利影响，在政策上处于被动地位。

(三) 岛内投资意愿低落。在台湾当局开始重视国外市场，开发出口加工业时，整个台湾

工业基础实际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有许多可供投资发展的先进工业生产技术,享受所谓“后进国家”的好处,而且当时的加工出口工业一大部分是原来的进口替代工业,已有相当的国内市场为其后盾,企业家可以放心投资获利。但是随着可供利用的加工出口机会的不断发展,以及加工出口产品结构的改善,简单的生产技艺越来越少,而先进生产技艺的取得又较困难,同时更由于出口商品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岛内市场支撑力日趋弱小,企业开发新产品越来越要担风险。因此,投资和创新意愿日趋低落,投资率连年下降。据统计,1973—1980年台湾平均年投资率为30%,1984年降为21%,1988年更落到14.5%。对此,台湾当局只得鼓励本地资本到海外寻求出路,以冲抵岛内投资不振所产生的消极影响。

(四)国际竞争激烈。台湾外贸的增长主要靠对外市场的开拓,随着国际市场上竞争对手越来越多,竞争愈演愈烈,对台湾的对外贸易造成很大的威胁。首先受到来自发达国家竞争的打击。目前发达国家纷纷采用自动化的生产方式,使许多过去劳力密集型的工业变为资本、技术密集型的工业。而台湾多年来仍停留在劳力密集型的加工产品上,日益失去竞争优势。其次是受到出口产品结构相似国家和地区,象南朝鲜、新加坡、香港和中国大陆等地奋起直追的竞争压力。第三,台湾外销产业经营规模过小,不利竞争。目前,台湾贸易厂商多达79000余家,多属小型家族行业,而日本、南朝鲜的对外贸易则相对集中于大型企业。台湾因商家数多而规模小,容易陷入自身的价格竞争中,从而削弱在国际间的竞争力。

二、措施

为了推动产业升级,促进经济转型的早日完成,近年来台湾当局实行了一系带长期性、战略性的措施,其主要内容是推行“自由化、国际化、科技化”为中心的一套新的产业、贸易和投资政策,为经济转型创造新秩序。

(一)加速金融自由化,国际化进程。所谓金融自由化,指的是台湾当局放松对金融业的规管,同时还包括允许金融业私营。金融业国际化是指放松外汇管制、资本管制,允许本地金融机构到海外投资执业,也允许外来机构涉足岛内金融市场,两者相辅相成。实现金融业的自由化、国际化是台湾当局完成经济转型的主要措施之一。1987年11月,台湾当局通过“外汇管制条例修正案”,对外汇管制开始解禁。1988年7月,台湾当局进一步放宽外汇管制,允许岛内居民每年可从岛内调出五万美元。在台湾当局的大力推动下,1989年台湾金融业自由化国际化取得显著进展,表现在:1.进一步放松对外汇的管制,使台湾外汇市场的自由程度与美、日、西德等国相若。此举被称为是“台湾外汇交易正式步入全面自由化的新纪元”的开端。2.放宽对证券业的规管及对外开放本岛证券市场。3.实施“银行法修正案”,推进银行业私营化,并放宽外资银行在台湾的经营空间,使得台湾银行业的开放程度跟香港相仿而胜于新加坡。4.开放保险市场。5.取消黄金进口关税。6.成立美元拆放市场。通过这些措施,台湾已成为仅次于东京、香港、新加坡的美元拆放中心,股市成交额仅次于东京和纽约,跃居全球第三位,外汇市场的自由程度已与美、日、西德相当,加之位居世界第二的巨额外汇存底,使台湾金融业的继续发展具有较大的潜力。

(二)发展产业科技,推动科技产业发展。产业科技的发展直接影响着经济转型的完成。台湾当局深感发展科技之重要与紧迫,决定在加速推动经济“自由化、国际化”的同时,采取有力措施,发展产业科技,推动科技产业的发展。目前,台湾当局发展产业科技的主要措施有:

1.确定发展产业科技的中长期目标。台湾当局发展产业科技的长远目标推动科技产业的发展,建立新的高科技产业和改造传统的劳力密集型产业,使工业朝技术密集、资本密集的方向发展,尽快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期望在90年代完成经济转型。为实现这一长远目标,台湾当

局制定了未来三年内要在资讯科技、生物技术和能源技术等“策略性”科技上的发展有所突破这样一个中期目标。

2. 疏通管道,大力引进国外科技。台湾独立自主开发科技能力有限,发展产业科技仍须走引进之路。因此,台湾当局决定采取“广开门路”、“积极引进”的做法。一是变在岛内“坐等”为“主动出击”。不仅通过吸引外资的方式来引进技术,更主要是通过对外投资来实现技术引进。二是政府部门、公营事业、财团法人等“多管齐下”,各显神通,以各自有利的条件,时机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形成一种“立体式”的引进攻势。

3. 借鉴“硅谷”经验,兴建高技术工业区。台湾从1980年开始,模仿“硅谷”建立“新竹科学园区”,9年来,该园区不断改善投资环境,吸引高技术厂商入园生产,1988年有9家厂商10项产品获“优良厂商新产品奖”,其中全友电脑公司的“MSF-400C影像处理器”被美国个人电脑杂志评为世界市场最受瞩目的科技产品。如今,新竹科学园区成了台湾科技产业重镇,对发展台湾产业科技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至1989年,进驻园区的科技公司已达104家,营业总值为490亿元。据预测,至1995年该园区的科技公司将达200多家,出口科技产品总值将“独占”台湾出口的三分之一。

4. 加速人才培养与开发。人才是台湾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实现其经济转型的决定因素之一。尽管台湾的科技产业还刚刚起步,但在人才培养、开发上,80年代可谓40年来最活跃、最有成效的时期。在此时期内,当局一方面在教育经费逐年增加的同时,调整教育结构,使教育与产业发展“步调一致”;另一方面则制定许多“优惠”方案,吸引海外留学生返台服务。

(三)分散外贸市场,平衡进出口比例。外贸市场的过分集中,使台湾经济受制于人,而外贸顺差的过大,既造成外汇积累过多,又容易引发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对此,台湾当局制定了分散外贸市场,平衡进出口比例的政策。具体做法是:加速解除不必要的进口管制,继续降低关税,以求增加进口;同时在出口方面,鼓励分散市场。1987年台湾当局制定了“对外贸易平衡发展方案”,中心是帮助业者拓展美国以外的新市场,尤其致力于对欧日的出口。该年台湾对欧出口激增62%,对日出口激增52%,而对美仅增26%,从而减轻了对美出超的压力。

(四)采取有力措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产业结构的调整是经济转型的前提。尽管多年来台湾当局一再呼吁要调整产业结构,但成效有限,难以满足经济转型的要求。为了加速产业结构的调整,今年五月,台“行政院财经会谈”提出了五条措施:1. 筹措新台币100亿元,成立“中小企业发展基金”;2. 合并中钢、中船、台机三家国营事业为台湾第一家“ME综合中心企业”,其所产之机电、化工技术能充分转移民间,以策动台湾经济转型;3. 消弭地下经济,全面检讨对服务业之管制;4. 推动国防科技转移民营企业,并委托民间企业开发研究军事科技;5. 成立商店自动化小组,规划未来台湾零售及批发业发展方向及奖励办法。

(五)适时修改法令条例,使政策规范化、制度化。这是台湾当局发展经济的一贯做法,以此保证优惠政策的贯彻实施。今年,《奖励投资条例》期满,台湾当局已推出《促进产业升级条例》,规定从事自动化、防污染设备生产的厂家投资抵减税收5—20%,从事研究开发可抵减30%。该条例还鼓励企业合并,扩大经营规模,鼓励对外投资,规定在海外投资股份占20%以上可抵减税收10—30%,等等。

三、前 景

经过四十年的苦心经营,台湾经济已经有了相当的基础,有了比较雄厚的实力,加之国际经济的发展,海峡两岸情势变化,这些都为台湾经济转型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一)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经济转型”已为各方面所认同,能够形成“同心协力”背水一战的

力量。早在1974年,台湾当局就已提出“经济转型”的概念。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冲击使台湾经济遭受重大挫折,1974年经济成长率从1973年的12.8%跌到1.1%,国民收入负增长1.9%。当时台湾当局的经济主管孙运璿、李国鼎、赵路东等人曾指出,石油危机只不过是偶然现象,根本问题是台湾经济的结构层次太低,劳力密集型产品加工出口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台湾应加速发展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虽然这些意见最初并没有被社会所认同和接受,但当时为台湾当局所重用的一批专家学者等“经济强人”却颇有同感,看出了问题的本质,提出了实现“经济转型”的重大措施。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劳力密集型产品加工出口的外部环境进一步恶化,也促使台湾社会各界初步认识到“经济转型”的必要与意义,认识到这一转型的成功与否不仅关系到每个厂家、业者的切身利益,也关系到整个台湾经济的前途命运。台湾当局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大力推动“经济转型”向前发展。1984年台湾出口电子产品65.96亿美元,超过纺织品的61.04亿美元,意味着“经济转型”取得初步的进展与成果。1986年以“自由化、国际化、制度化”为核心的第三次经改方案的推出,标志着台湾“经济转型”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1986年,科技产品的“主力”已经形成,出口额占总值的17.3%,1988年后,台湾电子产品、纺织、制鞋列为台湾出口的三大支柱,而科技产品大有“独领风骚”的势头。引人注目的是1989年台湾个人电脑占全世界总产的四分之一。这一切都为90年代完成“经济转型”奠定了基础。

(二)40年来台湾经济的发展,为转型的完成作了比较充分的准备。首先是经济高速增长。台湾工农业生产在1952年恢复到光复前的最高水平,国民生产总值达18.4亿美元。1952—1985年间,台湾经济增长率高达8.8%,1985年国民生产总值732亿美元,1988年续增到1196亿美元。人均收入从不到200美元提高到1989年的7518美元。其次,有巨额的外汇积累。1952—1968年的16年中,有四年台湾外贸处于逆差,1969—1980年的10年中,逆差年份降为3年,1980—1989年间,外贸年年盈余,1989年外汇存底为774亿美元,仅次于日本,每月外汇存底利息高达5亿美元。第三,基本实现充分就业。台湾人口密度高,50年代就有大量失业人口,后来由于发展劳力密集型产业,失业率由50年代的10%下降到1985年的2%,1988年继续降为1.4%,按西方标准已实现充分就业。第四财政健全,内外债务较轻。1952—1963年间,台湾有7年出现赤字,1963年以来基本实现财政平衡。自1952年以来,台湾发行的公债平均仅占政府收入的3%,而且外债不重,1986年外债总额40亿美元,仅为南朝鲜的十分之一,1987年继续降为14亿美元。第五,有较高的储蓄率。1957年台湾储蓄率为10%,1972—1985年维持在30%—34%之间,1988年上升到40.2%,创世界最高纪录。

(三)台湾当局的大力推进,有利“经济转型”的早日完成。为了突破困境、完成转型,因应世界经济一体化、集团化,减少贸易屏障,台湾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开放市场、放宽外汇管制,降低关税等,虽然这些措施有被动因应之嫌,但毕竟对促进台湾经济发展,推动经济转型早日完成起着重要的作用。例如,随着台湾金融、股票、外汇市场趋于健全,股市机构有所控制,有利于企业筹措资金,发展高科技、高资本产业。同时,分散外贸市场,使台湾在欧美等地建立了桥头堡,对吸收先进技术,超越贸易障碍等也产生了积极作用。

(四)海峡两岸投资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为台湾经济转型提供了契机。台湾经济转型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大批中小企业的出路问题。这些企业资金技术有限,升级乏力,关闭又可惜,沉重地拖着转型的后腿。随着海峡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大批台湾中小企业冲破禁锢,前来大陆进行投资贸易,这不仅对促进双方经济发展有利,而且在客观上也为实现台湾经济转型提供了极好的机会。

此外,(1)以美国为首的工业发达国家将进一步向中等发达国家和地区转移技术,而出于